

## 身份与观念：汉匈互仕现象探析\*

李 明

**【摘 要】**基于地缘等因素，汉匈两个政权接触极为密切。在西汉立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匈实力基本保持均势，但在短时段内又各有消长，因此战争与和亲交织甚至叠加进行成为二者独特的相处模式——这构成汉匈互仕的大背景。在汉匈互仕的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差异致使官员于两国的仕进路径不尽相同；汉匈实力的均势则使“华夷之辨”的观念并未对官员的仕途造成显著影响，汉匈互仕群体的身份认同也随着其居处地文化环境与政治体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向汉奉藩称臣，汉匈缔结了名义上的宗藩关系，汉匈互仕就此绝于西汉历史记载。

**【关键词】**西汉 汉匈关系 跨族群仕宦 民族交融 华夷观念

**【作者简介】**李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3-0094-26

跨族群的官僚选用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观察中国古代国家结构、族群关系与社会观念的重要窗口。但由于年代越古，文献便愈稀缺，目前很难了解秦汉以前的情况；<sup>①</sup>而秦的国祚又仅仅十五年，顷刻覆

\* 本文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得到雷虹霖、吴天宇、曹天江、刘壮壮等师友及匿名审稿专家的指正与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① 春秋战国时期宦于异国的事例寥寥无几，大抵在“诸夏”间发生，虽亦有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但著史者往往一笔带过，后人难以深入考察。

亡，此一时期跨族群仕宦之人同样于史无征。因此，若欲清晰地了解跨族群仕宦群体的最早情形，自西汉切入是一个较好选择。而在此时间段内，汉匈交往最为频繁与密切，并且战和交织，极具典型性，所涉史料也最为丰富，故成为学界研究跨族群仕宦行为着墨的重点，本文亦聚焦于此。

目前学界关于汉代跨族群仕宦现象的研究，一则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着重探究某人的个体经历或后世评价，无法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一时期的华夷关系与族群意识；<sup>①</sup> 间或涉及群体者，亦侧重于官员选用制度本身之原理、实施与效果，不仅对跨族群仕宦行为出现的原因与特征未加讨论，而且偏重对仕汉胡人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仕胡汉人群体。<sup>②</sup> 以群体史视角对西汉时期族群关系与民族观念加以探析的学术成果亦有，<sup>③</sup> 然所涉群体往往较为宽泛，侧重点不在官僚群体。但究实而言，一种时代观念（及展现观念之行为）普及的逻辑原点往往是国家或社会上层，观念普及的过程便是上行下效的过程，而西汉又可谓大一统国家族群观念演进的起点，从这一点讲，考察彼时的胡汉互仕行为同样十分必要。

本文不揣鄙陋，以汉匈两个政权为典型样本，试对西汉时期胡汉互仕群体产生的原因、仕进路径选择及身份转换逻辑加以考析，并进一步探求此一时期华夷秩序构建过程中的内在张力与历史实态。

## 一、汉匈互仕行为出现的动因及特征

西汉初期，跨族群的官僚选用普遍存在于各个政权，以至于朱家在为季布开脱时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① 参见乔琛：《休屠王阏氏与金氏家族——一个西汉匈奴家族的血统延续与文脉传承》，《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1~130页；马昕：《仕胡汉臣的历史评价分析——以李陵、王猛、许衡为典型样本》，《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40~51页。

② 参见晋文：《以夷制夷理论与两汉王朝的践行》，《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82~190页；王子今：《汉王朝民族战争中的“侯降”策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2期，第54~72页。

③ 参见张元城：《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38页；王子今：《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8页。

即南走越耳”<sup>①</sup>这样的“悖逆”之言。那么，胡汉互仕这一现象级行为究竟由何种因素促成，又具有哪些典型特征呢？下文即以汉匈互仕为例，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 （一）汉匈互仕行为出现的动因

张元城曾撰文分析汉人流落匈奴的情况，指出该行为出现的具体缘由或途径约有九端。<sup>②</sup>这九种因素大致涵盖了汉匈互仕行为出现的原因，具体则可归结为以下五点。

#### 1. 因利益纠葛与权力分配亡叛

因利益纠葛与权力分配进入另一政权的情况，汉匈双方均有出现，原身份为汉人的例证有韩王信、燕王卢绾等。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入都关中不久，燕王臧荼、颍川侯利几相继谋反，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态度逐渐暧昧。次年，强令韩王信徙于代，后者则主动要求治于更靠近帝国北边的马邑。同年秋，匈奴围马邑，韩王信因频繁遣使议和引发刘邦猜疑，被迫降匈，最终成为匈奴将领，“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sup>③</sup>韩王信降匈奴的同年，楚王韩信以谋反罪被黜为淮阴侯；后三年，赵王张敖下狱；汉十年，陈豨叛；汉十一年，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相继以谋反罪被诛戮；汉十二年，陈豨乱平。至此，西汉开国异姓王仅长沙王吴臣与燕王卢绾得以全身。但在陈豨之乱中，卢绾便已开始于汉匈之间摇摆，不久后，其“诽谤”之言<sup>④</sup>与“不臣”之举皆被刘邦知悉，后者再次做出了该王“反形已具”的判断，发兵击燕。彼时刘邦沉痾缠身，卢绾忧惧吕后对异姓王之态度，“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sup>⑤</sup>最终刘邦重病不治，卢绾顺势亡入匈奴，并受封东胡卢王。站在后见之明的视角，韩王信与燕王

① 《史记》卷100《季布栾布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05页。

② 九种因素分别为“内争中叛乱者的出降”“和亲人员的出嫁、陪嫁”“边境吏民的大量被劫出塞”“从军将士的被俘、投降及亡失”“出使投降或被扣、被劫”“边民亡降出塞”“犯法出逃”“投靠在匈奴的亲戚”“互市”。参见张元城：《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第24~28页。

③ 《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94页。

④ 卢绾尝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见《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99页。

⑤ 《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99页。

卢绾选择出仕匈奴的症结，无疑在于刘邦对“共天下”权力分配模式的不满。

公元前1世纪左右，因内争而出降汉廷的匈奴人亦不在少数，较为知名者有于单、日逐王先贤掸、乌厉屈、乌厉温敦等。于单本为军臣单于太子，军臣单于死后，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于单在与伊稚斜的军事斗争中失败，亡降汉，受封陟安侯。日逐王归汉的根源同样在于单于位继承的无序，《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会匈奴单于（引按：虚闾权渠单于）死，国乱，相攻，日逐王将众来降汉”，<sup>①</sup>《汉书·郑吉传》亦载“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sup>②</sup>同书《匈奴传上》记述最详：“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胸鞬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sup>③</sup>日逐王降汉不久，匈奴即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遼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sup>④</sup>

## 2. 因双边战争进入敌对政权

因双边战争出仕敌对政权的汉人与匈奴人占史书所记胡汉互仕群体的绝大多数。李陵、李广利、李绪皆由双边战争出仕匈奴，活跃于汉武帝时期的金日磾与其他多数胡人降侯亦以此故进入西汉政府。

李陵、李广利为读史者熟识，而李绪其人，史书对其仅有寥寥数语的记载，他得以见诸史乘，还“得益”于公孙敖将之与李陵混淆。<sup>⑤</sup>《汉书·李陵传》载：“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sup>⑥</sup>降胡后，绪曾“教匈奴为兵”。金日磾本为休屠王太子，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军大破匈奴休屠王与浑邪王部，匈奴单于欲惩治二王，二人恐诛，率众降汉。后浑邪王杀休屠王，将两部凡四万人入汉，原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及日磾母、弟亦在其中。入汉后，浑邪王受封漯阴侯，金日磾则累迁马监、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车骑将军，并在昭帝时受封秭侯。

除上述有名姓者，汉武帝时期所封的大批胡人降侯以及活跃于战事中的大量胡兵亦与汉匈战争脱不开干系。

<sup>①</sup> 《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66页。

<sup>②</sup> 《汉书》卷70《郑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5页。

<sup>③</sup>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90页。

<sup>④</sup>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96页。

<sup>⑤</sup> 参见《汉书》卷54《李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7页。

<sup>⑥</sup> 《汉书》卷54《李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7页。

### 3. 由私人恩怨引发的选择

中行说当数因私人恩怨出仕匈奴的典型。不过，中行说最初进入胡地是通过和亲途径，这也是其步入匈奴权力中心的前提。西汉文帝在位、匈奴老上稽粥单于在位之时，汉匈复修和亲之事，孝文帝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强令宦者燕人中行说为公主傅姆，随入匈奴。中行说与汉廷的矛盾就此结下，他在辞别故土时信誓旦旦：“必我行也，为汉患者。”<sup>①</sup>不想竟一语成谶，中行说入匈奴后，随即献媚于老上稽粥单于，并迅速进入匈奴的权力中心，为单于画策。

### 4. 犯法出逃

揆诸史籍，因此种原因出逃汉或匈奴，进而仕于其中某一政权的，仅见卫律一例。卫律父本长水胡人，生长于汉，曾被李延年荐举出使匈奴，延年及其弟李季淫乱后宫遭诛，律恐连坐，亡入匈奴，被狐鹿姑单于封为丁灵王。虽然类似事件再不见于史册，但不能据此以为犯法后出逃邻国乃是一种罕见行为。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廷议罢边备塞吏卒，反对者的理由之一便是“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sup>②</sup>——尽管犯法出逃邻国之人未必选择出仕，但依旧能威胁到母国的安全。因此，对主动亡入匈奴的汉地百姓而言，他们往往要受到汉地律法的追究，如文帝在位时即下诏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人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sup>③</sup>敦煌马圈湾汉简《捕律》中的相关司法处置亦可与文帝的诏令相互参照：“亡入匈奴、外蛮夷……皆要斩，妻子耐为司寇，作如。”<sup>④</sup>明文法的颁布及处罚的严重程度间接表明这种行为并非偶发。

### 5. 其他因素

导致汉匈互仕行为出现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汉匈互相扣留使节以及彼此用间等。《汉书·匈奴传上》载：“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之相当。”<sup>⑤</sup>在被匈奴扣留的汉使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苏武，考虑到卫律、李陵降胡后均曾作为单于说客对苏武进行劝降，可知匈奴扣留使者后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04页。

②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4页。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09页。

④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623页。

⑤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4页。

令其出仕己方是一贯做法。至于中原与匈奴互相用间的情况则可追溯至战国时代，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备战匈奴时，其练兵方略中即有“多间谍”一条。<sup>①</sup>至晚到汉初，对敌国用间已成常态，政府甚至为此设置了专门的律条，《二年律令·贼律》规定：“□来诱及为间者，磔。”<sup>②</sup>在汉武帝时期著名历史事件“马邑之谋”中，亦有间谍的身影，《史记·韩长孺列传》曰：“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sup>③</sup>不过，聂翁壹是否在匈奴出仕仍需进一步考察。

## （二）汉匈互仕行为的特征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西汉时期的汉匈互仕行为并非毫无规律可言，而是具有以下四个典型特征。

一是互仕行为具有群发性。这种群发性一方面由本邦动荡的政局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战争的旷日持久不无关联。前文偶及，汉武帝时期，一场战役动辄导致成千上万人亡没。《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sup>④</sup>同书《匈奴列传》又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sup>⑤</sup>据学者统计，仅武帝时期，汉朝将士因战败投降、被俘及作战中亡失而流落于匈奴的数量就在5万以上。<sup>⑥</sup>再如，武帝元朔、元狩年间，先后有19位匈奴贵族来降并被封为列侯，背后皆有战争因素的推动（详后）。频繁且大规模的战事自然致使汉匈互仕行为群发。此外，匈奴的政治体制也是汉匈互仕呈现群发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帝国形态的部族联盟”式国家的中下层社会极易脱离控制，甚至由此导致国家的崩溃与颠覆。<sup>⑦</sup>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

① 参见《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968页。

②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③ 《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61页。

④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854页。

⑤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24页。

⑥ 参见张元城：《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第26页。

⑦ 参见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辑：《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87年版，第74~82页。

七位“匈奴王”同时来降以及日逐王、浑邪王入汉时的仆从人数皆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汉匈互仕行为的发生具有阶段性。实际上，与其说该行为的发生具有阶段性，毋宁讲该行为的诱因导致了这种阶段性。简单而言，当两国政局稳定与双边关系缓和之时，互仕行为即很少出现，反之则大规模发生。俟呼韩邪单于奉藩称臣，互仕行为即绝于西汉历史记载。

三是史籍所载跨族群仕宦之人物多有长期在汉匈交界地带生活的经历。韩王信封地左迁于代，中行说本燕人，李陵乃陇西人士，牵涉李陵之事的李绪为汉塞外都尉，李广利则是中山籍，他们居处的这些地域在汉朝及汉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均可视为华夏的边疆，是胡汉交流较为频繁的地区，因而此地之人仕于不同族群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而战争的频繁发生则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优势放大。匈奴一方可考的几位重要部落首领，如日逐王、浑邪王、休屠王等，其统领之故地均毗邻汉境。浑邪王来降后，汉以其降众置五属国，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证明其与休屠王所辖地域于匈奴而言亦属边疆。至于日逐王之领地，即汉人眼中的西域诸国，《汉书·西域传》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sup>①</sup>河西四郡开辟后，西域诸国与汉王朝亦取得了更为直接的联系。

四是历史人物的跨族群仕宦行为在大多情况下并非出于单一原因。以李广利为例，家收与兵败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他降于匈奴，这提示我们，不可将汉匈互仕行为发生的动因简单化与模式化。

## 二、汉匈互仕群体的仕宦路径选择

钩稽史料，可知跨族群仕宦官员的晋身路径在汉匈两个政权中存在一定差别。仕于匈奴政权的汉人，多以婚姻、受爵、拜将等与匈奴单于建立君臣关系；而于汉地出仕的匈奴人，则以“宦皇帝”与受封列侯的方式开启他们的宦途。

### （一）汉人仕胡的多重方式

#### 1. 婚姻

以婚姻方式与匈奴单于建立君臣关系的汉人有李陵、李广利等。《史

<sup>①</sup>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页。

记·李将军列传》载：“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sup>①</sup>《汉书·李陵传》则言：“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sup>②</sup>李陵通过婚姻的方式步入匈奴政坛后，曾为单于劝降苏武，其子则直接参与了虚闾权渠单于死后“五单于争立”的纠纷，《汉书·匈奴传下》言：“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sup>③</sup>除此之外，汉代史料中再未见李陵及其后嗣的政治活动。

李广利降匈奴后，亦被单于招纳为婿，《汉书·匈奴传上》记此事始末曰：“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sup>④</sup>在稍后发生的一场汉使与匈奴官员的辩论中，单于“左右”言：“汉，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何也？”<sup>⑤</sup>以此诘难汉使，证明贰师降胡后曾为匈奴详解汉廷时局。

需要说明的是，简单的胡汉通婚并不构成出仕匈奴的资格，李陵、李广利之所以能参与匈奴决策谋划，是因为他们本身或家声赫奕，或为汉贵臣，并且姻亲对象为匈奴单于。归根结底，降胡汉人原本在汉廷的崇高地位是建立这种姻亲式君臣关系的前提。

## 2. 封爵

最初以受爵方式出仕匈奴的汉人为故燕王卢绾。卢绾亡入匈奴后，匈奴以绾为东胡卢王，绾率其党“往来苦上谷以东，终高祖世”。<sup>⑥</sup>不过，从卢绾被匈奴赐予的王号及“上谷以东”的地理坐标判断，卢绾的封地并不在匈奴传统或狭义的统治区域内。史籍记载，冒顿单于在位初期，匈奴与东胡间有弃地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sup>⑦</sup>而上谷的位置正处于汉、匈以及东胡三方的交界地带，结合冒顿“大破灭东胡王”的相关史迹，我们可合理地推测卢绾封地实则位于东胡故地。

卢绾之后，卫律被匈奴封为丁灵王，李陵被封为右校王，赵信被封为自次王。既有研究显示，这些王号并不属于匈奴常设的“二十四长”。关于丁灵，《史记·匈奴列传》记有冒顿“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

① 《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78页。

② 《汉书》卷54《李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7页。

③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96页。

④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页。

⑤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页。

⑥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4页。

⑦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94页。

国”，《索隐》引《魏略》云：“丁零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习水七千里。”<sup>①</sup>《汉书》颜师古注曰：“丁灵，胡之别种也。”<sup>②</sup>可见丁灵在冒顿以后成为匈奴的一个部族。司马迁在《史记》中叙述匈奴的官职体系时曾言，匈奴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sup>③</sup>姚大力推断，诸如白羊王、楼烦王之类的王号，“应即‘小王将’行列中之‘裨小王’”。<sup>④</sup>按此，丁灵王亦属裨小王之列。至于右校王、自次王，汉史中不见李陵、赵信以外加此二号者。按匈奴二十四长的官职序列，右校王或为二十四长的别译或二十四长以下官长的名号，但史阙有间，在没有文献佐证的情况下，同样不宜贸然将其归入“二十四长”之列。关于自次王，张守节《正义》谓“自次者，尊重次于单于”，<sup>⑤</sup>这显然是一个望文生义的判断——虽亦有可能，但自次王终归不是匈奴常设官爵名，在缺乏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即便“自次”二字的含义果如张守节训释的一般，其实际权力也必然受到束缚。总的来看，无论是东胡卢王、丁灵王还是自次王，虽有王之号，但单以名号论，皆不处于匈奴统治圈层的传统核心之中，更多是因人设爵，为收一时之效。

### 3. 为将

以将领身份出仕匈奴者有韩王信与李绪等，二人事迹前已述及。不过，在匈奴“帝国形态的部落联盟”式国家结构下，领兵将领多为某部君长。例如，燕王卢绾降匈奴后为东胡卢王，率其党“往来苦上谷以东”，身为匈奴丁灵王的卫律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与匈奴右大都尉“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sup>⑥</sup>考虑到韩王信入匈奴也非个人行为，而是“以城降”，降胡后同样领有其部众，类似匈奴部落之酋长，可见在匈奴社会中，将领的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其他身份的附庸。

### 4. 成为单于近侍 / 近臣

中行说与卫律都身兼单于近臣的角色。中行说于匈奴的身份虽史无明言，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98~3499页。

② 《汉书》卷54《李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8页。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96页。

④ 姚大力：《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的演化——早期北亚史札记》，《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2期，第50页。

⑤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14页。

⑥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9页。

但其本身便为宦者，结合史书中“单于甚亲幸之”“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sup>①</sup>等记载，可知其大抵扮演了单于身侧拾遗顾问者的角色。卫律的近臣身份则为其亲口所言，在张胜等“谋反匈奴中”<sup>②</sup>的事件中，他便口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颜师古以为，“近臣”即“卫律自谓也”。<sup>③</sup>《汉书·李陵传》亦载：“匈奴爱之（引按，此指卫律），常在单于左右。”<sup>④</sup>

## （二）胡人仕汉的不同路径

### 1. “宦皇帝”出仕

在通过“宦皇帝”出仕的胡人中，最为典型者即金日磾家族。如前所述，金日磾本为休屠王太子，父为浑邪王所杀，被裹挟降汉，其仕进履历前文已有交代。日磾及其身后，金氏家族“七世内侍”，显赫非常。金氏家族最盛时曾出现一门两侯的景况，金氏后人金赏、金敞、金遵俱官至西汉九卿。

金日磾以“宦皇帝”出仕，于己而言是被动选择，其父浑邪王已故，金日磾在汉无任何庇护与身份，更遑论政治背景与政治网络，这样一个人仿佛天然绝于仕途。但正因如此，西汉皇帝反而能安心使用。《汉书·金日磾传》载，日磾初得幸，“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sup>⑤</sup> 相较朝堂势力盘根错节的汉人官员与贵戚，身为匈奴人的金日磾在仕进过程中反而有其独特优势，在此情境下，金日磾寄附于皇权、成为“宦皇帝者”，是其与汉武帝的双向选择。

历代皇帝用宦者，大抵都存有“中人无外党”的考量，“宦皇帝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他们与通过其他途径入仕的官员是天生的敌体。金日磾家族在附骥皇权并与其他政治势力对抗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形成了“世名忠孝”的家声，<sup>⑥</sup> 但这也进一步将金氏家族推上了“孤臣”之路，令其不得不世代“宦皇帝”。金日磾，日磾子赏、建，金伦子安上，孙敞，曾孙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04、3506页。

② 《汉书》卷54《苏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0页。

③ 《汉书》卷54《苏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2页。

④ 《汉书》卷54《李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7页。

⑤ 《汉书》卷68《金日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60页。

⑥ 金氏第三代金敞以“世名忠孝”被王太后留侍成帝，第四代金钦则以“家世忠孝”被选置为平帝友。参见《汉书》卷68《金日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63、2964页。

涉，玄孙汤、融等俱有“侍中”经历。其余见于史册的西汉金氏后代也同样有担任卫尉、胡骑校尉、越骑校尉、奉车都尉、诸曹中郎将、光禄大夫、太中大夫给事中、太子门大夫、中庶子、尚书令等皇帝、太子近臣（侍从官）的仕宦履历。

关于金氏家族的婚姻，史籍中几无迹可寻，唯知金赏曾娶霍光之女，金赏卒后无子国除，后来奉嗣秭侯的金氏家族第四代金当则与王莽是姨表亲。这说明金氏家族的婚姻并不限于匈奴人内部。金氏家族不仅在血缘上逐渐与汉人融合，而且在文化上慢慢汉化。金涉、金钦兄弟二人皆明经术，其中金钦更是“举明经”入仕。金氏家族在汉地繁衍四代后已与汉家高门无甚区别。

在西汉政府中以“宦皇帝”出仕的匈奴后代还有公孙贺。不过，相较金日磾家族而言，公孙贺并不具有典型性。史书言公孙贺本胡种，<sup>①</sup>义渠人，其家族至晚自其父（《汉书》作“祖父”）公孙浑邪（一说“昆邪”）时便开始在汉为官。《汉书·公孙贺传》载：“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以将军击吴楚有功，封平曲侯，著书十余篇。”<sup>②</sup>《汉书·艺文志》言西汉有书名《公孙浑邪》，凡十五篇，被班固纳入阴阳家者流。<sup>③</sup>史载公孙浑邪为陇西太守时曾举晁错为太子家令，后坐法失侯。<sup>④</sup>

公孙贺少年时曾为骑士，至武帝为太子时，官太子舍人；武帝即位，贺又被擢为太仆，曾以太仆的身份兼领轻车将军、车骑将军、左将军、浮沮将军从卫青等出击匈奴，功封南窳侯，得爵五岁，坐酎金失侯；后迁丞相，复封葛绎侯。公孙贺仕途之顺遂，一方面与金日磾有一定相似性，其所任太子舍人属于典型的“宦皇帝者”，武帝为太子时便与公孙贺长期相处，后者得幸实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与汉武帝的连襟关系，《汉书·公孙贺传》

① 王国维、吕思勉、白鸟库吉等均认为所谓“胡”或“胡人”本为匈奴专名，岑仲勉则进一步指出，“胡”之指代群体自匈奴到西方中亚民族的转变，发生在东汉时期。笔者以为是。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3《史林五·西胡续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9页；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0册《读史札记·胡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5页；[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36页。

② 《汉书》卷66《公孙贺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77页。

③ 参见《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4页。

④ 参见《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91~2292页；《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功臣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37页。

载：“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sup>①</sup> 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在公孙贺迁丞相后代其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烜赫一时。

公孙家族自浑邪开始逐步进入朝堂核心。囿于文献的稀缺，我们无从得知公孙浑邪是如何成为陇西太守的，但他的军功与文学无疑是其仕途中的助力。鉴于彼时的郡守拥有举贤良的资格，自公孙浑邪始，公孙家族在朝中应已结交了一定的政治人脉。前文述及，公孙浑邪曾举晁错为太子家令，而同时举荐晁错的还有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颍阴侯灌阿、廷尉宜春。要言之，五位勋贵重臣，其中包括列侯、掌刑名的九卿、地方郡守，以身份而论彼此几乎毫无干系，却因颍川人晁错联结在一起，结成了一张暂时的政治关系网络。在网络建构的过程中，六人（包括晁错）彼此之间的利益勾连或私人之谊应发挥了一定作用。公孙氏以军功、文学起家，但至公孙贺一代转向了宠臣之路，不过，公孙贺成为太子舍人，无论是通过“任子”还是“察举”，均离不开其家族前期积攒的政治资本发挥的作用。

关于公孙家族的汉化程度，从公孙浑邪之名不难看出，在文化表征上，其家族在浑邪一代仍留有胡人烙印，但浑邪又明习阴阳学说，并且能立言传诸后世，应属于汉化程度较深的胡人后裔。武帝时期，公孙贺以胡人之后宰执汉王朝，说明至少在文化上，到公孙贺一代，其家族的胡人基因已极为稀薄。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得以“宦皇帝”的胡人或胡人后裔原本的身份地位都较高，甚至比之一般汉人，他们更遵从汉地的伦理道德或更注重明习汉家文化。当然，甫入汉地的“初代”胡人与家族已在汉地繁衍多代的胡人后裔得以“宦皇帝”的原因不尽相同。

## 2. 因降封侯出仕

西汉的“侯降”政策肇始于景帝时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

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sup>②</sup>

再向前追溯，早在楚汉战争时期，为策反项羽部众，汉王国便已将“率众降”列入其功劳体系之中。《史记·高祖本纪》载：“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

<sup>①</sup> 《汉书》卷66《公孙贺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77页。

<sup>②</sup> 《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523页。

万户。”<sup>①</sup>至七国之乱时，刘濞在“遗诸侯书”中亦提到：“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sup>②</sup>到西汉中叶，汉廷对匈奴率众降者已有了明确的封赏标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记载：

□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赐黄金五百（D38：4）

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D38：7A）

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五百卅八卅八（D38：7B）<sup>③</sup>

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至迟于元狩二年便已颁布，目的是配合此一时期的对匈战争。<sup>④</sup>这也是当时仕汉胡人骤然增多的原因之一。

据笔者统计，不计原韩王信与燕王卢绾的子孙及金日磾家族，匈奴降汉封列侯者共32人（见表1），在这32人中，又有宜冠侯高不识、辉渠侯仆朋、杜侯复陆支、众利侯伊即轩、开陵侯成婉5人立有战功，<sup>⑤</sup>故不能简单计作因降封侯。也基于军功，5人中除开陵侯成婉封户未知，其余四人封户均大抵在千户以上。<sup>⑥</sup>在剩余27人中，翕侯赵信的情况较为特殊，他因降封侯，后又因战功益封。

① 《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67页。

② 《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23页。

③ 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④ 关于“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时间的研究，参见[日]大庭脩：《汉简研究》，徐世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朱绍侯：《吕后二年赐田宅制度试探——〈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第12~16页；秦铁柱：《西汉时期匈奴归义列侯论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第56页。

⑤ “杜侯”，《史记》作“壮侯”，五侯事迹分见《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37~1238、1242页；《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48、651~652、662页。

⑥ 辉渠侯仆朋的封户数虽亦无明确记载，但其与宜冠侯高不识皆“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再出击匈奴”得封侯。仆朋后又因“从骠骑将军二年虏五王功”益封，其封户数或在高不识之上。参见《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38页。

这 32 位胡人列侯有 7 人封于景帝时期，3 人封于宣帝时期，其余 22 人均受封于武帝时期，这主要是武帝时期汉匈双方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接触导致的。景帝所封 7 名胡人列侯中，2 人封户数量未知，4 人封户超过千户，确认在千户以下的仅容城侯徐卢一人。至武帝时，由于来降者众，加之《击匈奴降者赏令》的出台，使相关军功报酬标准进一步明确，故而匈奴降侯受封户数急剧下降。除因战功封侯及有名号的匈奴贵族，其余降王、裨王仅得数百封户。

表 1 《史记》《汉书》所见匈奴降汉封侯者

封侯时间	人物	原身份	获封侯爵及户数	传国世数(包括第一代)及失侯原因
汉景帝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子	于军	匈奴王	安陵侯 (1150 户)	一代；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薨，无后
汉景帝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	赐	匈奴王	桓侯	史籍阙载
汉景帝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	陆彊 (一作“隆彊”“李隆彊”)	匈奴王	迺侯 (1570 户)	两代；孝武时彊子则坐诅祝上，腰斩
汉景帝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	徐卢	匈奴王	容城侯 (700 户)	三代；孙光，坐诅祝上，腰斩
汉景帝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	仆黜 (一作“仆黜”)	匈奴王	易侯 (1110 户)	一代；无后
汉景帝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	范代	匈奴王	范阳侯 (6200 户)	两代；子德，无后；玄孙政诏，元始二年(2 年)获爵关内侯
汉景帝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	邯鄲	匈奴王	翕侯	一代；坐行来不请长信，免
汉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 131 年)十月壬午	赵信	匈奴相国	翕侯 [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击匈奴益封，1680 户]	一代；元朔六年复降匈奴
汉武帝元朔元年后九月丙寅	乐	匈奴都尉	特轅侯 (650 户)	一代；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薨，无后
汉武帝元朔二年十月癸巳	月氏	匈奴相	亲阳侯 (680 户)	一代；元朔五年坐谋反入匈奴，腰斩

续表

封侯时间	人物	原身份	获封侯爵及户数	传国世数(包括第一代)及失侯原因
汉武帝元朔二年十月癸巳	猛	匈奴相	若阳侯 (530户)	一代;坐谋反入匈奴,腰斩
汉武帝元朔三年四月丙子	于单	匈奴单于太子	涉安侯	一代;无后
汉武帝元朔四年七月庚申	赵安稽	匈奴王	昌武侯	两代;子充国,无后
汉武帝元朔四年七月庚申	桀龙	匈奴相国	襄城侯 (400户)	两代;子病已,坐沮祝上,下狱瘐死
汉武帝元狩元年七月壬午	王援訾	匈奴赵王	濼侯 (560户)	一代;无后
汉武帝元狩二年五月庚戌	高不识	匈奴人	宜冠侯 (1100户)	一代;坐击匈奴增首不以实,当斩,赎罪,免
汉武帝元狩二年二月乙丑	仆朋	匈奴人	辉渠侯	两代;子雷电,征和三年,以五原属国都尉与贰师将军俱击匈奴,没。后代不详
汉武帝元狩二年六月乙亥	諱毒尼	匈奴王 (浑邪王之裨王)	下摩(麾)侯 (700户)	三代;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诏諱毒尼孙冠支,居弋居山,坐将家属阑入恶师居,免
汉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	昆(浑)邪	匈奴昆邪王	漯阴侯 (万户)	两代;子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薨,无后
汉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	应疤(一作“扁訾”)	匈奴王 (浑邪王之裨王)	辉渠侯	一代;元鼎三年薨,无后
汉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	乌(禽)黎	匈奴右王 (浑邪王之裨王)	河綦侯 (600户)	两代;子余利鞬,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薨,无后
汉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	稠雕(一名“调”)	匈奴大当户	常乐侯 (570户)	两代;子广汉,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薨,无后

续表

封侯时间	人物	原身份	获封侯爵及户数	传国世数(包括第一代)及失侯原因
汉武帝元狩四年六月丁卯	复陆支	匈奴归义因孰(淳)王	杜侯(1300户)	五代;玄孙福,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坐非子免
汉武帝元狩四年六月丁卯	伊即轩(軒)	匈奴归义楼剽王	众利侯(1100户)	三代;孙辅宗,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薨,无后,为诸县
汉武帝元狩四年六月丙子	敞屠洛	匈奴符离王	湘成侯(1800户)	一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汉武帝元狩四年六月丙子	董舍吾	匈奴都尉	散侯(1100户)	三代;孙贤,征和三年坐祝诅上,下狱病死
汉武帝元狩四年六月丙子	雕延年	匈奴王	臧马侯(870户)	一代;无后
汉武帝元鼎四年六月丙午	次公	匈奴归义王	瞭侯(790户)	一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汉武帝天汉二年	成婉	匈奴介和王	开陵侯	三代;孙褒,无后
汉宣帝神爵三年四月戊戌	先贤掸	匈奴日逐王	归德侯(2250户)	五代;玄孙霸,东汉永平十四年(71年)有罪免
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九月癸巳	王定 <sup>[1]</sup>	匈奴乌桓屠慕单于子左大将军	信成侯(1600户,后坐弟谋反,削105户)	三代;元始五年,侯杨以定孙绍封,千户。后史籍阙载
汉宣帝五凤三年二月甲子	乌厉温敦	匈奴諱连累单于 <sup>[2]</sup>	义阳侯(1500户)	一代;坐子伊细王谋反,削爵为关内侯,食邑千户

资料来源:本表据《史记·孝景本纪》《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书·宣帝纪》《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汉书·地理志》《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等整理。《史记》《汉书》所载侯国户数相异者,取《汉书》。

[1]《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的王定,或为《汉书·匈奴传下》所言乌厉屈,即乌厉温敦之子,《史记·匈奴列传》言其为新城侯,系呼韩邪单于左大将。《功臣表》中记述的乌桓屠慕单于或为諱连累单于。王定坐弟谋反削封地事与乌厉温敦坐子伊细王谋反削爵事极为吻合。

[2]非单于也。据《汉书·匈奴传下》及颜师古注,乌厉温敦为呼遼累,呼遼累为匈奴官名。

表1中诸例可证,因降封侯者主要是匈奴贵族,其中宜冠侯高不识与辉渠侯仆朋在匈奴之身份地位未知,《汉书》仅记其为“故匈奴归义”,二人均系“以校尉从票骑将军再(出)击匈奴”<sup>①</sup>得封。

景帝所封7位列侯,1人在内史,4人在涿郡,1人在魏郡,仅桓侯赐封地未知。武、宣时期所封降侯也多在内郡。<sup>②</sup>需要明确的是,景帝以下降侯之封邑乃实封,其侯爵并非空具名号,这些匈奴贵族进入汉地后,即与其原部众分离,因此才能传国多代,《史记》《汉书》也才能较为清楚地记载侯国世袭情况。在这些侯爵中,无后国除者14人,犯罪夺爵者15人,后嗣不详者3人,也即近半数胡人列侯被夺爵,其中不乏下狱死者、腰斩者。这样的结局证明汉廷对他们有实际的控制力,并且对待他们与汉人无异,否则不会以“坐诅祝上”“坐将家属阑入恶师居”“坐非子”“酎金”等罪名将之夺爵或处死。值得一提的是,亲阳侯与若阳侯均因谋反入匈奴被腰斩,二人犯法所受之刑与前文提及的敦煌马圈湾汉简《捕律》中的律文内容完全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匈奴降侯所受司法待遇与汉人一般无二。

与此同时,某些降侯的后代则进入了汉王朝中央。以日逐王为例,其入汉后受封归德侯,以刘为姓,第三代归德侯刘飒(一作“飒”)在更始帝到长安后被大臣举荐与陈遵共同出使匈奴,可以说真正融入了汉王朝政治之中。归德侯传爵凡五代,及至东汉明帝时方有罪夺爵,是降侯中传国时间最长的一支。结合容城、范阳、潦、辉渠、漂阴、河綦、臧马、归德等侯国之封君死后均获谥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这些匈奴降侯与汉廷之间并无隔膜,二者缔结的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松散的君臣关系。

不过,绝非所有率众降汉的匈奴贵族均拜爵封侯,上表所举复陆支即其中较为特殊者,复陆支本“归义”为属国王,仍领有其部众,后因从骠骑将军击匈奴有功,乃更封列侯爵。宣帝时,复陆支之孙屠耆堂因定策之功益封爵邑,<sup>③</sup>故复陆支封侯后应转还中原。上表所列其余“归义王”或与复陆支经历类似。因此,受封“归义王”等名号乃是“侯降”政策外匈奴贵族依附汉廷的另一种方式,可视为匈奴部落领袖由匈奴贵族身份向汉廷臣子身份过渡的一个节点。考虑到匈奴“归义”君长仍领有其部众,故其最后结局是

① 《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48页。

② 参见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85~291页。

③ 参见《汉书》卷8《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240页。

完全融入汉廷还是反叛，抑或终身保留“归义”的名号，在其身死前尤未可知。质言之，并非所有的匈奴“归义”君长都会转化为汉王朝的列侯，进而与帝国休戚与共。汉廷取缔其“归义”君长的身份与否取决于双方的共同意愿及现实形势。《汉书·冯奉世传》即载：“元帝即位……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sup>①</sup>同样是在元帝时，郎中侯应亦曰：“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sup>②</sup>可见属国内的“归义”胡人有很大的政治、军事自主权。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的出土亦证明了这一点——该枚印信的出土地点已然说明匈奴贵族在受封汉廷“归义”名号后与汉廷缔结的是一种不甚紧密的君臣关系，并且“归义”名号可终身保留。这枚印章虽是东汉时期的物品，但其制度渊源当能溯至西汉。

### 3. 其他路径

在“宦皇帝”与“降侯”“归义”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胡人以“胡骑”“胡巫”的身份为汉服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sup>③</sup>同书《匈奴传上》又载：“（征和三年）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sup>④</sup>管中窥豹，西汉政府对胡骑的运用应当极为娴熟。

作为一种神秘职业者，胡巫在汉王朝亦十分常见，帝国境内有一批专门为皇室服务的胡巫。在巫蛊之祸中，江充即曾“将胡巫掘地求偶人”。<sup>⑤</sup>另《汉书·地理志下》载：“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sup>⑥</sup>可知胡巫会主持某些常规性祝祭。

除此之外，追随张骞出使西域的堂邑父亦为胡人，堂邑父在受封“奉使君”这一荣誉名号后，便不再见诸文献，或许很快泯然于西汉庙堂之内——相较以“宦皇帝”与“降侯”出仕者，这是大多数胡人官员的共同命运。

① 《汉书》卷79《冯奉世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95页。

②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4页。

③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7~738页。

④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9页。

⑤ 《汉书》卷45《江充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78页。

⑥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5页。

### 三、汉匈互仕群体的观念抉择与帝制中国早期 华夷秩序构建的窘境

研究汉匈互仕群体，必然要对该群体行为选择背后的观念加以探讨；而无论何种观念的产生与演进，又无疑与彼时之社会环境和国家结构有密切关联。因此，厘清此一时期汉匈各自的忠诚观念、权力结构以及族群意识便显得尤为关键。

#### （一）“忠”的观念与族群认同

对跨族群仕宦群体“忠”这一观念的考察，看似一伪命题，实则不然。通过上文所举案例可以看出，在多数情境下，该行为群体中的胡人与汉人并非主动要求奔于他国，更多是基于情势的无奈选择。史怀梅认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忠都被视为边界和族性关系的必然产物。是忠于国家还是忠于民族，或者较为理想地是同时忠于两者，则要看是选择政治认同还是选择民族认同，或是同时选择两者。”<sup>①</sup> 史氏的言论较好地揭示了“忠”这一行为观念的发生逻辑，点明了“忠”之实践的复杂性及其与边界、族性的隐幽关联。但在帝制中国<sup>②</sup> 早期，情况似乎更为繁复，这种情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政体与社会结构的遽然变化导致的。

以刘邦建汉后韩王信、卢绾亡匈奴为例，彼时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及异姓王与汉王国分庭抗礼的政治局势即对二人的行为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地理上讲，汉王国与异姓诸侯国之间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这就导致了彼此之间隔阂的产生与治下臣民效忠对象的不明确性；而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产生与政体建立方面讲，刘邦称帝的法理支撑是“功最高”“德最厚”，而非血脉承继或前朝禅让。<sup>③</sup> 在这种情势下构建的“有限皇权”与“联合帝国”<sup>④</sup> 缺乏神秘性、至上性与权威性，过分依赖刘邦的个人魅力与功劳维系彼此之间的主从关系，

① [英] 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曹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7 页。

② 本文所言“帝制中国”，系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的古代中国。

③ 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 2023 年版，第 158、262 页。

④ 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 2023 年版，第 264~268 页。

难以令异姓诸侯成为刘氏与汉家天下的忠实拥趸。此外，西汉初年也缺乏培植“从一而终”式忠诚观念的土壤。学界之所以将秦至汉初接近八十年的时间称为“后战国时代”，<sup>①</sup>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彼时社会葆有或盛行的意识观念直接承自春秋战国。就“忠君”观念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忠君”行为一则具有条件性，二则显示出不稳定性：“臣下与君主的关系不需要‘从一而终’，如果无利，或是不合‘原则’，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另换主人，而并不失其‘忠臣’的美名。”<sup>②</sup> 西汉承春秋战国之余风，虽继秦之后再次完成了大一统，但观念的扭转非朝夕之事，因而韩王信、卢绾忠诚的“转移”也有其时代因素。

韩王信、卢绾二人，其原本的忠诚对象一为刘邦，二为“共天下”的权力分配模式。韩王信《报柴武书》开篇“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sup>③</sup> 一语，是对上述判断的最好注脚。卢绾在听闻刘邦死后即亡匈奴也能对此稍加证明。然而，无论是对君主的“忠”还是对权力分配模式的“忠”，本质上都属于政治认同。韩信、卢绾不满于汉地皇权的专制性而投匈奴，实际上间接表明了对匈奴政体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可能是相对的。早在战国时期，先祖为晋人的由余作为戎王代表使秦时便称言：“（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sup>④</sup> 及至西汉，中行说在与汉使辩论时亦言：“（匈奴）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sup>⑤</sup> 可见此类观点有一定的流传轨迹及受众。

到了西汉中期，臣子对君主的效忠标准与程度又出现新变化。史怀梅通过对汉代经典中管仲故事的分析，指出汉代确立了等级差异型“忠”的标准，“这一标准就是为主人献身，之前仅由春秋时期的士实践过这一标准”。<sup>⑥</sup> 李陵降胡时，言“无面目报陛下”，或可为史氏的论断增加一定说服力。汉武帝

① 参见雷戈：《论“后战国时代”》，《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第67~73页；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280~283页；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② 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83页。

③ 《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95页。

④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5页。

⑤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05页。

⑥ [英]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4页。

时期，异姓王已于汉王朝消失，同姓王的封地与权力亦被翦除大半，汉王朝官员任用、迁升制度的革新使官吏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由此加强，此时中央的权威性远迈汉初，忠君的观念自然有所发展。在“家天下”的权力承继模式下，“忠君”与“爱国”在多数情形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在战争中特定情境下的投降行为实则是被默许的，除非战败后仕于胡廷，彼此成为仇讎，否则投降者并不会以叛国罪论处。<sup>①</sup>例如，李陵降胡后，武帝并未对其家人施加刑罚，反而派遣公孙敖前往匈奴腹地迎还，直至汉廷误以为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后，才对其家族施以极刑，陇西士大夫此时方“以李氏为愧”。<sup>②</sup>

“忠”之观念除在时间轴上有所演变，在横向的各个地域空间上，亦非完全均质地为整个社会持有。一般而言，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相对距离多少会影响民众的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其效忠对象的选择，这一点为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者不断证实。<sup>③</sup>因此，正如前文揭示的，汉匈互仕群体具有出身边疆的特征。

相较政治认同，帝制中国创立之初其境内人口的族群认同并不十分强烈，韩王信虽在《报柴武书》中提到“旦暮乞贷蛮夷”<sup>④</sup>云云，但其与卢绾频繁寇边汉境的行为令该言论缺乏可信性。这一问题涉及单数“华夏”概念的生成与“华夷之辨”观念在帝制中国早期的受挫，容后详论，兹不赘言。

再看匈奴社会的忠诚观念与族群认同。涉及这一话题的著名案例是握衍胸鞬单于在左奥鞬王死后立自己的幼子为奥鞬王，奥鞬部贵人共立故奥鞬王子为王以示反对，“与俱东徙”。<sup>⑤</sup>托马斯·J.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

① 《二年律令·贼律》规定：“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然而，这项规定反映的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之前汉廷与诸侯国的关系，律文的归着点也侧重于对领土的戍守，李陵的境遇不符合律文中的任意一项内容，其战败也并非由其本人所致。

② 《汉书》卷54《李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7页。

③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56页；朱圣明：《汉代“边民”的族群身份与身份焦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第50~61页。

④ 《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95页。

⑤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90页。

据此认为，一个匈奴部落群体的忠诚首先是对自己的部落首领，其次才是对单于和他的朝廷。浑邪王、乌孙昆莫脱离匈奴时带走了大量部众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统治游牧帝国的困难之一是其组成部分实际上可以迁徙。如果部落能够离开单于的直接统御范围，后者惩罚部落的能力就会受到严重限制。<sup>①</sup> 如其所言，在古代社会，如果最高统治者运用庆赏威罚的权力都受到限制，那么其部下的忠诚度就必然会大打折扣。极而言之，匈奴单于只能保证其下属二十四长等少数人的忠诚，而二十四长、裨小王等部落首领的治下之民，其忠诚是奉献给各自氏族或者部落的。从奥鞬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血缘是维系个人对氏族 / 部落忠诚的重要纽带。

讨论“匈奴人”的族群认同，必须明确一个关键问题：“将匈奴视为‘民族’，可能忽略了‘匈奴’此一政治体所涉及的人群很广，时间很长，且各部落似乎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此政治体。”<sup>②</sup>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便不得不将匈奴的族群认同纳入政治体视角下考察，因为组成匈奴的各个部落虽在饮食、衣着、习俗、生产方式上趋同，但其最初被抻成一体，还是基于现实的政治、经济需求。<sup>③</sup> 至少在帝制中国早期与匈奴的接触中，后者即便有所谓的族群认同，也是作为政治认同的附属品而存在的，亦即“因情势变化的族群认同”。<sup>④</sup> 毫无疑问，这种“因情势变化的族群认同”推动了汉匈互仕现象的出现。

## （二）单数“华夏”概念的萌发与“华夷之辨”观念的受挫

上文提到，我们很难在早期的汉匈交往过程中发现汉人群体有较为强烈的族群认同，在这一问题上，汉匈两国的情况有一定相似性。不同的是，西汉王朝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用多种方式对帝国内部的差异进行了弥合，进而

① 参见 Thomas J. Barfield, *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 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1(1), 1981, p.51。

②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0 页。

③ 巴菲尔德认为，匈奴之所以能以帝国形态持续生存并稳定下来，并非因为其内部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族群，而要归功于它作为中原政权与草原部落之间的“中间人”发挥的作用。参见 Thomas J. Barfield, *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 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1(1), 1981, p.47。

④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0 页。

塑造了一个单数的“华夏”，因此有必要拿出来单独讨论。

新归附人口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淡漠是多民族大一统王朝创建初期面临的必然挑战。“帝制中国”这一政治形态生发之前，“诸夏”的共同称谓是维系中原列国间关系的纽带，但实际而言，各国各区域间的风俗差异依然较大。秦汉两代，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但六国遗民对故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难以即刻抹除。此外，大一统王朝不独涵盖了传统的“诸夏”疆域，更是存在所谓“内地的边缘”——在这里，国家权力缺失、人口来源复杂、各种非正统意识形态对聚居于此的人群影响较大。<sup>①</sup>因此，帝国创立初期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便是将“诸夏”及疆域内的少数族裔糅合为一个单数的“华夏”。秦始皇在完成六合一统后的历次巡游、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整齐乡俗”、禁止淫祠滥祀等行为与政令均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然而，统治者虽意图“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现实却是“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佚）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殿（也），而长邪避（僻）淫失（佚）之民，甚害于邦”。<sup>②</sup>显然，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秦的迅速覆亡与汉初分封制的恢复及黄老之术的施行等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即便再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也无法短时间内抹除人们思想中的文化烙印。我们或可将这一情形描述为单数“华夏”的难产。

汉武帝后，官吏选用制度的日趋完善与儒家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扩散虽使单数的“华夏”成为可能，<sup>③</sup>但这毕竟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华夷问题在统一的“华夏认同”形成之前就显得颇为尴尬：“诸夏”的观念与各异的地方风俗无法在短时间内消解，汉王朝内部的文化差异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甚至比华夷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何况其疆域内本就有所谓“内蛮夷”及介于蛮夷与编户民之间的边缘群体存在。这种内部的异质性是帝制中国早期“华

① 参见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第121~128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③ 关于此点，严耕望即论曰：“官吏任职出入内外，外试庶政，熟察民隐，内观国光，谙习制程，破地方之隔膜，寄薪向于中央，使中央地方凝为一体。两汉始由列国割据，汇为一统，控制为难；而卒能享国四百，政自内腐而外无瓦解之祸者，此其效乎？”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333页。另可参见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4~13页。

夷之辨”观念受挫的第一个原因。

再者，所谓“华夷之辨”本质上是“贵华贱夷”，是用“他者”凸显自己的族群特性及优越感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服务于中国古代国家华夷秩序的结构。但当华夷双方实力相当甚至华夏一方处于军事弱势时，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很容易被遮蔽或者让位于政治、军事现实。举例而言，匈奴报送汉廷国书上强调的“胡者，天之骄子也”“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sup>①</sup>即对中原自春秋战国以来奉行的传统华夷观与天下观的抗议，而文帝遗匈奴国书所言“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sup>②</sup>则是对现实中两国对等关系的默认与反馈。另一个例证是，在汉史书写中，司马迁将匈奴的祖源追溯到了夏后氏，此一情况为《史记》“四裔传”仅见——类似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的叙事模式虽在后世史籍中相对常见，但在司马迁的时代，这种书写当有更为特殊的政治用意。我们知道，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胡人君主会通过建立与华夏历史的联系，来淡化或遮掩自己的“夷狄”身份，其中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宣称自己的族群派生自黄帝或炎帝的祖先谱系，<sup>③</sup>那么在《史记》关于匈奴祖源问题的叙述上，则很可能是司马迁主动淡化匈奴的“夷狄”身份，借此掩盖汉代中国华夷秩序构建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尴尬。进言之，匈奴在汉史中既可与华夏共享同一远祖，正说明在现实中其实力与汉匹敌。

以长城为界，“南有大汉，北有强胡”<sup>④</sup>是时人的普遍认知。而汉匈通过和亲的方式达成“昆弟”之关系后，这种“南汉北胡”的格局更加难以改变。匈奴这一“非正朔所加”的“敌国”虽然一时为秉持“王者无外”信条的武帝击败，并在宣帝时期入朝称臣，但是其由“敌国”向“外臣”的身份转换终西汉一朝都没有完成。换言之，匈奴在此一时期并未完全被纳入汉廷构建的华夷秩序之内。因此，我们会发现，即便将目光延及西汉末哀帝在位时期，扬雄仍言“（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sup>⑤</sup>

①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3756、3760页。

② 在汉文帝时期的汉匈交往中，这样的问候语似乎成为双方往来国书的固定格式，在《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中多次出现。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02、3505、3508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8、3760、3762页。

③ 参见胡鸿：《华夷》，陈侃理主编：《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29页。

④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页。

⑤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2页。

### （三）官员复归本邦与汉匈互仕泯于史乘

既然“华夷之辨”在汉匈外交实践中鲜少被正式提及，那么无论胡人抑或汉人，在仕于对方政权时就都少了一层观念上的隔阂。也正因如此，帝制中国早期汉匈互仕的行为相对频繁，而且不乏在两个政权间左右游移者。韩王信与卢绾二人的子孙后代便在高后至景帝时陆续归汉，并且获封侯爵。值得一提的是，韩王信后嗣归汉后，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汉廷平灭吴楚七国之乱、伐匈奴、伐东越、巫蛊之祸、更立皇帝等重大军事、政治活动。韩王信玄孙韩增更是一度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韩氏受封的龙颡侯国至王莽时方除。卢绾的后嗣亦传国四代，最终因涉卫太子谋反事除国。匈奴一方降汉又复归本邦的代表为前文述及的翁侯赵信，其原身份为胡小王，降汉后获封翁侯，并在元朔二年对匈奴的作战中因军功益封，后于元朔六年的汉匈战争中军败，将残骑八百降匈奴，被匈奴单于封为自次王。匈奴对其极为重视，为之筑“赵信城”。这些于本邦而言亡而复归的人群，之所以能够很好地为两个政权再次接纳，除其本身对原政权有所价值，复归时汉匈的实力对比也是重要因素。

汉宣帝在位时期，呼韩邪单于“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sup>①</sup>太子太傅萧望之在正旦朝会上针对单于礼仪位次问题提出的建议仍是“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sup>②</sup>尽管彼时将呼韩邪单于视为“夷狄”归化，主张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诸侯王下”<sup>③</sup>的大臣不在少数，但是宣帝最终仍未将呼韩邪单于完全作为臣下看待，而是以“客”目之，最终裁定的结果以诏书的形式下达：

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sup>④</sup>匈奴之于汉廷的“外臣”身份在西汉一朝始终是不彻底的，汉廷赐予匈奴单于玺印之印文不言“汉”且言“玺”可为一证。<sup>⑤</sup>新朝建立后，王莽易“匈

①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97页。

② 《汉书》卷78《萧望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2页。

③ 《汉书》卷8《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0页。

④ 《汉书》卷8《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0页。

⑤ 参见[日]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究》，《秦漢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0年版，第241页；[日]阿部幸信：《西汉时期内外观的变迁：印制的视角》，黄桢译，《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第5~15页。

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sup>①</sup>正是有意重构中原王朝与匈奴之关系。

不过，匈奴单于之玺印虽言“玺”不言“章”且未著“汉”字，但毕竟是由汉廷颁发的，诸王以下之玺印亦皆由汉廷授予并有“汉”言“章”，这些人在名义上均属于汉之“外臣”。因此，随着汉匈关系的变化，互仕行为相对减少，抑或不再被史官刻意记录，从而不为后人所见。

####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现实的政治局势与官僚选用体系的弹性设计构成了官员在不同族群间流动的核心动力。在汉匈实力保持均势的情况下，政治理性使双方突破传统的“华夷”边界——匈奴以联姻、近臣擢用、授予特殊爵位等非制度化手段吸纳汉地精英，汉廷则通过“宦皇帝”“侯降”等制度设计整合匈奴势力。这种官僚选用体系的差异，正是游牧与农耕政权不同国家组织形态的微观呈现。

从观念史层面考察，在帝制中国早期，汉匈双方的族群认同更多作为政治认同的附属品而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王朝构建“华夷秩序”的过程中，外交文书与史册中的相关书写折射出政治实践与思想观念的复杂互动。例如，在统一的“华夏认同”形成前后，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地知识精英将匈奴祖源追溯至夏后氏的记忆改编，既可理解为时人对“南汉北胡”双强格局的默认，又可视作重塑“大一统”合法性的重大文化工程。这一通过历史书写弥合族群身份差异的做法，不仅为胡汉互仕现象找到了一定的法理支撑，而且遮掩了“华夷秩序”构建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尴尬。

要言之，胡汉互仕是帝制中国早期政治生活中一类相对特殊的现象。这种跨族群的官员流动，不只是特殊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文明融合进程中中国人在场的历史见证。本文所述汉匈互仕群体的生命流动轨迹，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观察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线索。

（责任编辑：张梦晗）

<sup>①</sup> 参见《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0页。